

〔日〕宫坂正行 著

战后日本 政治舞台内幕

—政府・自民党・财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内幕

——政府·自民党·财界

〔日〕官坂正行 著

耕 夫 译
王之顶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译 者 耕 夫

译者地址 上海

1989年

本书内容 日本政治内幕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译者 耕 夫

译者地址 上海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本书 全四册·第五册

北京·1989

《政府·自民党·财界》

宫坂正行 著

三一书房出版

1970年

战后日本政治舞台内幕

——政府·自民党·财界

〔日〕宫坂正行 著

耕 夫 译
王之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7.125印张

154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

ISBN 7-80050-126-4/D·17

定价：2.95元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为《政府·自民党·财界》，其主要内容揭露战后日本政治舞台上政府、自民党、财界三位一体的政治内幕。作者主要是站在日本民众的立场上，揭露自民党长期保守政权的弊端。同时对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的多党化、未能形成团结力量也进行了批评。作者希望在野党能够团结战斗，改变自民党长期一党专政的局面。

作者极力主张日本应该更早的恢复日中邦交，推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广泛开展。

作者通过本书告诉读者，在战后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政府、自民党和财界三者是掌权者。书中用大量的材料，说明官、政、财三者是如何结合起来统治日本人民的。本书内容为了解日本的政治现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日本现代史有较大参考价值。

由于译者翻译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9年5月1日

代 序

一九六九年末的总选举结果，保守专制政权的安定性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以动乱的七〇年为期限的安保条约原封不动，带有讽刺意味的佐藤政府，借助于大量的弃权和在野党的多元化、再分化，成了我国党政史上保守政权最长证录的挑战者。但是，果真当今的国会能代表全国人民吗？公害和高物价、住宅困难和重税等，我们身边周围的政治黑暗丝毫没有改善的气氛。由于老朽的自民党和财界、高级官僚粘着在一起的政治团体——日美安保体制派强有力的统治机构战胜了反安保、拥护宪法派的事实是明显的。我们今天、高喊成立“革新政权”之前，首先要把这个安保体制派的统治机构搞得十二分清楚。

在日本所谓安保体制派、拥护和平宪法派是两大政治势力。以自民党为核心由财界、官界和一部分即得利益集团结成安保体制派，是现在日本的政治势力。这个安保体制派所制造的政治黑暗的根源在哪？它又是怎样地毁坏了战后培育起来的和平宪法的民主主义思想呢？简单地说，所说安保体制范围很广，从新右派到老右派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有头脑的骨干中坚官僚是颇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随着拥护和平宪法派势力的强大使之离开安保体制派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势力是必要的。

这本书是一位记者写的，是剖析七十年代日本政治舞台内幕的调查报告。

目 录

序论 迎接七〇年代	(1)
一、国会能代表国民吗？	(7)
1. “不代表全体国民的议员”的诞生	(7)
2. 空虚的“特权阶级”	(26)
3. 腐蚀国权的最高机关	(39)
4. 自掘坟墓的强行表决	(58)
二、政府、自民党、佐藤派、财界	(78)
1. 无视宪法的保守党政府	(78)
2. 自民党的内幕	(89)
3. 权力主导者、佐藤派的政治资金	(102)
4. 指挥自民党的财界	(123)
三、操纵国政的官僚	(132)
四、保护权力的警察、检察、自卫队	(153)
1. 七〇年代权力的目、耳、口	(153)
2. 这就是检察、警察	(170)
3. 国家的暴力机器・自卫队的实况和目标	(188)
结论 七〇年代日本的政治	(209)
结束语	(218)

序 论

迎接七〇年代

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众议院进行选举的结果，自民党二八八席、社会党九十席、公明党四十七席，民社党三十一席，共产党十四席。（选举之后不久，无党派议员的加入使自民党变成三百席，民社党变成了三十二席。）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认为这是依靠工会的社会党的失败，也有的人把这看成是自民党的胜利。这都是对事实的片面理解，都没有能把问题说清楚。这个选举的结果必须看成是在一九六〇年代建立起来的政界（自民党）、财界、官界等为三位一体的安保体制派对反安保体制派——拥护和平宪法派的胜利。这里所说的六十年代、具体的指从一九六〇年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开始到一九六九年根据佐藤·尼克松会谈发表的日美同共声明为止。不管怎么说，认为这次选举结果仅仅是自民党的胜利，这是一种极为近视眼的看法，而且简单地认为社会党的失败、公明和共产两党的胜利也是危险的。诚然，公明，共产两党的议席数增加了，而两党的胜利是吃掉了同是拥护和平宪法派社会党的议席的结果。如果说自民党是公明、共产两党头号的共同“敌人”，那么自民党不是由于“在野党多元化”现象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体制吗？

“都是政治黑暗”。市民所议论的公害、重税、保安的

危险性、大学纠纷的激化、高物价等周围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结论都归咎于“政治黑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多数市民只满足于“政治黑暗”这个结论，致于政治上如何的黑暗？黑在哪里？如何改良这种黑暗的政治却不加深究。像这样持消极态度的市民，使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选举中所显示出来的是安保体制派战胜了拥护和平宪法派。

现代政治黑暗的根源在于政（自民党）、财、官界的紧密勾结，歪曲了本来的民主政治。请看图1。像载入中学、高中、大学的教课书中所示图1那样，说明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如何分立的，是如何保持着民主政治的。但是，如果认为现实的政治会像图1那样实施，则就大错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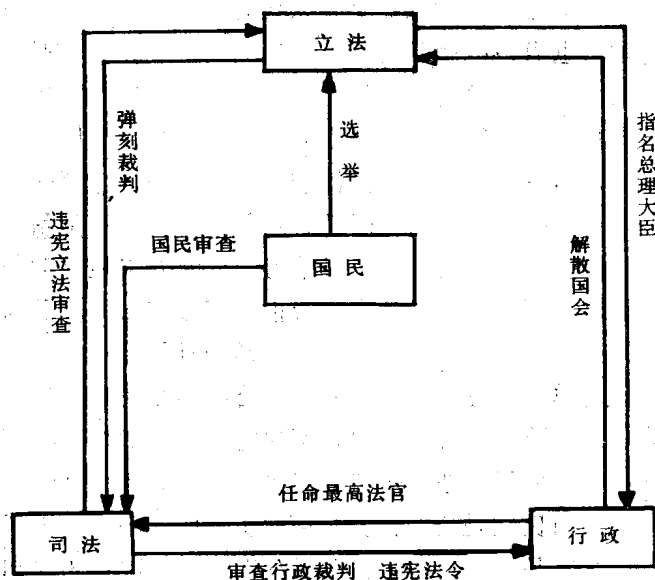


图1

错了。图2这样才说明了战后日本政治的现实。战后日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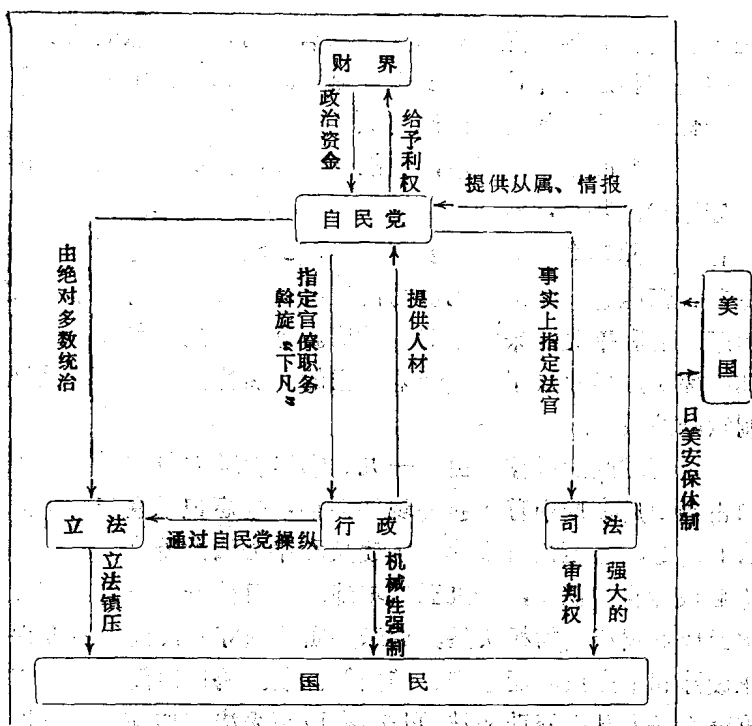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相互之间不但未保持抑制和均衡，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与接受财界援助的自民党结合在一起，作为自民党和财界的尖兵统治着国民。自民党通过政治资金这条渠道与财界相连（有的是特定的地域关系者），更有甚者是这些政（自民党）、财、官（行政、司法）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同美国拴在一起。有人认为“日本政治黑暗的根源在于自民党的反动性”。还有的人认为是在于美日垄断资本的利己主义和压力，保守政治家、官僚缺乏自立性等。可是这样说法都不充分的。政治黑暗的根据就

是政、财、官界，尤其是与美国结合具有广泛含意的日美安保体制和推进这个体制的安保体制派。那么在六十年代这样的安保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因一九四五年的战败，由战前政友会、民政党相结合的保守政治的基盘，强固的官僚组织解体了，日本的权利被置于占领军总司令部（GHQ）的指挥之下。这个占领军总司令部图谋阻止日本的反动势力的复活，以某些宣扬理思主义的理念的和平宪法来组成日本政府。并且，这个宣扬理思的和平宪法，后来成了反美色彩很强的革新势力。因此，是讽刺意味的议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的暴发，美国占领当局在同中苏对抗的现实面前，也忘记了遵守和平宪法的理念，甚至让日本建立了违反和平宪法的警察预备队（后改为自卫队），一九五二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当成亚洲反共的桥头堡。后来历届的保守党内阁，都在谋求废除和平宪法，而遵守日美安保体制。鸠山内阁时提出以重整军备为基础修改宪法。可是，在改革宪法方面在野党发现了比原来更多的国民持强烈反对姿态，因此，保守党内阁用强化安保体制的办法把和平宪法所具有的行政权力变成了一纸空文。这种尝试的正式开始是决定（一九六〇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六〇年代的十年间。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而清醒过来的财界，从“指导”一九五五年保守统一时起，就以庞大的政治资金公然与自民党紧密勾结，该党取代以前的美军占领当局站在支援指挥的立场上，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财界首脑明确表示改宪。官界也在吉田内阁重用的官僚和长期保守政权下，同这些保守党财界勾结，为的是自己出息发迹。对保守党和财界的政策立案给予了全面协助。

就这样安保体制派和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对立，持续到七〇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保安体制派由于进行匆匆忙忙地返还冲绳而以某种形式把核武器带入本土，抽掉了和平宪法的实质，并策划其完全解体的同时，倘若断然实行小选举区制，把在国会里的在野党反对改宪势力降至三分之一以下，形式上已朝着改宪的目标前进了。

本书的目的是从广意的角度阐明体制方面即安保体制派的具体情况。

第一，阐明作为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的立法机关即国会没有代表全体国民这一现实。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说“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事实上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是官僚、工会和宗教团体的代表，而不是所谓主权者的国民。而这样的国会听任掌握过半数的自民党及其背后的官僚的摆布。

第二，说明把立法机关变成私有化的历代保守党政府、自民党以及统治自民党的佐藤派、财界等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读者在这里会知道历代保守党政府如何地无视和平宪法和热心于确立安保体制。同时在这里，对七〇年代的政府、自民党、操纵佐藤派的财界试做具体的叙述。

第三，阐明在背后支持安保体制的害群。由于一九四五年的战败，支持保守党、财阀、军阀等军国主义的团体的崩溃，一小撮高级官僚的地位也垮台了。可是，重要的官僚体制本身一点也未动摇，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孕育出来的战时、战后派官僚逐渐的伸张势力，登上了统治今天日本的政治午台。除非把这个不可理解的官僚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组，否则民主主义的根基就不能巩固生长。

第四、由于安保体制派的权力机构需要力量保护，那

末，警察、检察和自卫队是干什么的也就清楚了。

“七〇年代日本的政治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从头叙述的话，于六十年代完成了的安保体制即第一至第四说明的安保体制则从一九七〇年代正式开始活动。但是，这种安保体制派的政治，岂止是刺激了公害，安保的危险性、高税、大学纠纷、高物价，而且具有把日本再次推向军国主义道路和毁灭的道路的危险性。在阻止这样危险的道路活动中，必须实现市民们人人参加的拥护和平宪法，或者归还和平宪法的政治运动。

在结论里，展望政、财、官界互相紧密勾结的安保体制派，是如何左右日本政治的具体动向，对此、反安保体制派和市民的任务就明确了。在这里特别关于非暴力的直接民主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也谈到了。

类似这类的书常常是把种种理论领先的教条、先形成感情、无道理的结论强加给读者。在这里作者首先尽量如实地掌握从现实展开的政治实况。其中插入几个插曲也是为了上述目的。就连自称为安保体制派的人读了本书也确信对他们有很多帮助。读者由于读了本书而抓住了日本政治权力的本质，结构和行动，共同创造自己应该遵循的理论，确立行动的指南是作者的愿望。

一、国会能代表国民吗？

“两议院是由代表全体国民选举产生的议员所组成。”（宪法第四十三条）。可是，成为现实国会议员的人们，不是职业和地区的承包人，就是电视演员或者以宗教团体为后盾的人。

1. “不代表全体国民的议员”的诞生

不幸的开端

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日本国会开设以来八十年间，现代被称为民主政治的时代，二十岁以上的所有日本国民都给予平等的选举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进行的第三十二届大选不用说也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可是称为平等选举权和被选权的民主政治的前提，正在逐渐变成了残骸，这是战后的实际情况，这就给日本民主政治的将来投下了不安的阴影。

如果把八十年间的日本政治史分成几个“阶段”，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一八九〇到一九二四年的“闲锁政治时代”，第二时期是把一九二八、九年作为中心的“政治家寿终”的时代。接着，迎来了一九四八年“一亿总政治家时代”，一九六七年政党的多党化现象出现，国政可以说进入

了“包办时代”。在这里，把这四个时期具体说明一下。

一八九〇年二月十一日制定了我国最初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议会政治好容易就绪了。该法把选举权限制在每年缴纳十五圆以上的国税缴纳者身上。不仅如此，众议院的职能仅仅是作为天皇的统治机器存在，从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在同年的六月四日，公布了贵族院伯、子、男爵以及多额纳税者议员改选规则。实际是承认了没有国民选举的议会存在。国民选举贤良，又为选举贤良而提名候选人是加大限制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闭锁政治时代”。

並且，对这样的闭锁政治，国民既没有实际亲自参政权，又不能提出主张。原因是一八九〇年开始的议会政治，是由于被剥夺权力的爱国公党（板垣退助系）、再兴自由党（大井宪太郎系）、大同团结（河野广中系）等所谓自由民权派对开设议会的要求，“当权者”的萨长土藩阀政治家对他们妥协的结果而诞生的，一般国民的要求没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余地。诚如一分日刊报纸所批评的：“把我国选举法中的选举权的资格同欧洲各国相比是过于狭窄的。”（一八九〇年七月三日《读卖新闻》）但当时的日刊报纸是偏于一党一派的政论报纸，其批判也是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的。

这样，一八九〇年七月一日的选举在三府四十二县进行，选出了三百人，其名单是：中江笃介（自由、大坂三区、思想家）、尾崎行雄（改进、三重五区、朝野新闻论者）、小坂善之助（中立、长野一区、信浓银行总经理）、犬养毅（改进、冈山二区、朝野新闻记者）、竹内纲（爱国、高知一区、矿业）、植木枝盛（爱国、高知三区、思想家）、河野广中（大同、福岛三区、思想家）等，帝国议会是由压

倒多数的自由民权主义者和少数界财人氏、县议会议员等人所组成。这次选举的结果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自由民权主义者来说都得到了应有的满足。

其次在一九〇〇年，尽管众院的选举权得到了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国民集会、结社权被取消了，社会运动以至于劳工运动都遭到彻底的镇压。更在一九二五年实行男子普选制，废除了附带财产条件的选举权的限制，给予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选举权（有权者由三百万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万人），但仍然不允许妇女参政。

政治家死亡了。

不过，其后，议会政治多多少少还是向国民开了一点门户，这也是事实。男子普选权实现以后，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的第十六届选举中，选出了森恪（栃木一区）、三木武夫（东京一区）、鸠山一郎（东京二区）、安部矶雄（东京二区）、永井柳太郎（石川一区）、尾崎行雄（三重二区）、水谷长三郎（京都一区）、山本宣治（京都二区）、西尾末广（大阪三区）、铃本文治（大阪四区）、河上丈太郎（兵庫一区）、斋藤隆夫（兵庫五区）、犬养毅（冈山二区）、浜口雄幸（高知一区）、中野正刚（福岡一区）等。这些人当中至少在当时是有“气魄”的所谓政治家之类的人物。不论他们的思想以及志向如何，总之，以“国民”为基础的第一代政治家出现了。

但是，议会政治建立以后，虽然迎来了约四十年的“政治家时代”却又被偷偷到来的军靴脚步声给踢开了。有的政治家不但迎合军部、还与其合作，有的则由于严厉的镇压而抹杀了本来的形象。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山本宣治（劳农党）在神田宿舍被右翼杀害这件事可以说是“政治家时代结束”

的象徵事件。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的《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议员尽管早在一个月以前就有遭到袭击的传闻，但（身边的警备）却不注意宿舍的安全，警视厅只在政府高级官员的身边给予十余名警卫。正在政治警察日益遭到谴责时，包括警察总监及其下属当然有责任。”经常谴责往往与右翼相勾结的当局的态度。

然而，由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接连发生的苦迭打，及太平洋战争暴发等，就连这个《读卖新闻》也开展了声援体制的运动，发表了下列报导：《暴戾·对美英宣战布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御楯的决心·尽忠学徒的大阵势》（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壮烈·冲绳军官民一体的斗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展开维护体制的宣传活动。

从一亿政治家时代走向包办时代

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无条件投降，议会政治也迎来了自由化时代，这就成了我国议会政治第三期的一亿总政治家时代。根据新宪法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女子同男子同样给予普选权，为了实现大体上完全的政治民主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进行的战后最初的众议院选举中，不只把认真考虑政治的人，而且把政客、沽名钓誉者、不定职业的人等等互相掺杂地都立为候选人。与其说是政治自由化时代，不如说是政治混乱时代更为恰当。

在这样的众议院中，除了所谓“政治家”的鸠山一郎、铃木茂三郎、德田球一之外，还有歌唱家（石田一松）、杂志编辑者（原健三郎）、小姐（山口静江）、江湖商人头目（铃木仙八）、护士（山崎即藤原道子）、少壮官僚（早川崇）、大学教授（铃木义男）等被选进国会。

另一方面，参议院也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的第一次选举开始施行了普选。这次选举如像鱼铺（青山正一）、古董商人（大山安）、天理教干部（柏木库治）、汽车司机（蟹江帮产）、寺庙住僧（来马琢道）、作家（中野重治）、剧作家（金子洋文）、公司负责人（藤井丙午）、牧场主（町村敬贵）等不同色彩的人参加。

当时我国由于所谓占领的压力，“输入”的民主主义制度未成熟，但是，总觉得给全体国民带来了走向光明前途的希望。可是，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间粮食的紧张状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不能说是富裕。正因为日常生活较艰苦，市民们有追求政治的某种可能性而积极参与立候选人。

这样，在当选者中也有了这样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或者是为了想让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能看到，甚而有的是被说明了的人、有被捧上台的人，更有的人是受到威胁而进入了国会。”（亨利·菲利——英国政治评论家）、特别是政治上无党派的绿风会，由于有所谓一些以押宝为目标的“冒险家”“闻运者”的存在，绿风会则出现了更多当选者，这是象征“一亿总政治家”时代的现象。

行业和地方的包办人

那么议会政治的第四期的现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特意命名为包办政治家时代，已在前面叙述了。现代的政治家有时是为了把特定职业集团、而有时是为了把特定地区的利益反映到政治当中来，而被召集到国会里的。

一九六七年的众院选举，以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有二十五人当选为议员，迎来了政黨黨化的时代。而且在一九六九年的众院选举中，公明党的要力更成倍增长至四十七人，推进了多党化。诚然，如同社会党、社会党